责编：龚克　E-mail:gongke@ccps.gov.cn　Tel:010—62806124　　2014年8月4日

专家视点

邓小平选人的五条标准

□倪德刚

1989年5月31日，在征得陈云、李先念同意后，邓小平找李鹏、姚依林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次谈话的核心内容之一是选什么样的人进中央领导班子。

邓小平深知选人重于泰山。他结合自身经历讲了一段党史，他说：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那么，改革开放后，怎样选出“成熟”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呢？邓小平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五条标准。

选改革者。改革大业不半途而废，改革巨轮顺利航行，必须选坚定的改革者。其一，选改革者是最重要的一条。邓小平说：“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要使人民感到面貌一新，感到是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班子。这是最重要的一条。这是向人民亮相啊！人民是看实际的。”其二，选改革者是大局。邓小平指出：“有一个新的改革的面貌，是确定新班子成员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九分九，而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要看到这个大局。”其三，不选改革者就会经常闹事，就会永无宁日。邓小平强调：“如果我们摆一个阵容，使人民感到是一个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认为是个平平庸庸体现不出中国前途的班子，将来闹事的情形就还会很多很多，那就真正永无宁日。”

邓小平强调选改革者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强盛中国，决定改革大业的成败在于改革者、在于改革者在改革历史进程中大有所为。

选开放者。放眼世界搞改革，打开国门搞建设，选开放者同样决定中国命运。邓小平交待了两点：一是不许关门，封闭就会造成灾难。邓小平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在那种状态下，经济不可能发展，人民生活不可能改善，国家力量也不可能增强。现在世界的发展一日千里，每天都在变化，特别是科学技术，追都难追上。”二是要干起来，大开放。邓小平指出：“一个好班子，搞改革开放的班子，就要明白地做几件开放的事情。凡是遇到机会就不要丢，就是要坚持，要干起来，要体现改革开放，大开放。”选开放者，邓小平进一步设想：我们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我们本钱少，但可以通过开放，增加就业，搞税收，利用地皮得点钱，带动发展各行各业，增加财政收入，获得益处。

邓小平强调选开放者是因为开放才能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民族复兴。

选实干者。实干兴邦，威信来自干实事、干成实事。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干者，特别是把在改革开放中干出实绩的人选进中央领导班子是邓小平一贯的用人标准。他指出：“一个是组成具有改革开放形象的中央领导班子，使人民放心，这是取信于民的第一条。第二条是真正干出实绩，来取信于民。”邓小平还考虑一个更深层次的长远问题，即新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和新组建的中央领导班子，怎样在较短时间内树立威信，邓小平深知靠老同志的威望和提携都不是长久之计。他的办法和出路就是“实干”，邓小平说：“新的领导机构应该做几件改革开放的事情给大家看。三个月内，半年内，形象就可以树立起来了。”他还交待说：“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总之，“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

邓小平强调选实干者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党的阶段任务、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选公认者。邓小平说：“我诚恳地希望，在选人的问题上，要注意社会公论，不能感情用事。要用政治家的风度来处理这个问题。”公认，邓小平强调：“使党内信得过，人民信得过。”邓小平用“诚恳”二字讲“公认”和两个“信得过”，怎样识别公认者和信得过者。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四条原则：一要在改革开放方面做出实绩。二要在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坚定不移。三要在反腐败方面动真格的。四要在团结方面不搞小圈子。

邓小平强调选公认者是由党的性质、人民的愿望、社会的稳定所决定的。

选人“三要”。一是“要抛弃一切成见，寻找人民相信是坚持改革路线的人”。二是“要抛弃个人恩怨来选人，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要用”。三是“考虑人的角度，也要深化，这也是一种改革，是思想上的改革，思想上的解放”。邓小平讲的“三要”，核心是用坚持和敢于改革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摒弃个人私见，以党的大业为重，放宽视野选人。也就是说，在深化改革用人思路和方式中选“准”人。

邓小平强调“三要”是由党的新老交替、党长期执政、执政有力所决定的。

在改革开放时代选党的中央领导人，邓小平特别强调两点：其一，“进入新的政治局、书记处特别是常委会的人，要从改革开放这个角度选”。其二，“我们现在就是要选人民公认是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并有政绩的人，大胆地将他们放进新的领导机构里，要使人民感到我们真心实意要搞改革开放”。

总之，选改革者、开放者、实干者、公认者以及“三要”思路是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最终取得胜利的历史时期的主要用人原则和标准。

邓小平最后明确讲：“我请你们把我的话带给将要在新的领导机构里面工作的每一个同志。这就算是我的政治交待。”邓小平关于怎样选好中央领导人的五条标准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一文中。

理论动态

提高领导干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领

□张红岭

用正确的方法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实践结合灵活运用，有效破解现实问题，应是每个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看家本领”。

原原本本地研读原著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习近平对全党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首先要选好经典文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最为本源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习近平专门提到，可以把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这两部文集作为党员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权威性教材。他还指出，可在这两个权威文集基础上，选择“代表性的篇目”研读。在笔者看来，2012年新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都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

在此基础上，要“原原本本地研读”，要把它作为科学体系来把握，不能“空对空”，必须要联系实际、联系历史、联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也就是：不能撇开原著，不读原著；不能泛读、一知半解地读；要认真把握原著的思想、观点、问题、写作背景、理论与实践脉络，以及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影响和当代价值。正如习近平所言：“读马列、学毛著，要精，要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细地读，下一番真功夫。”只有“原原本本”地研读原著，才能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同时，研读原著并不是仅仅把握原著的个别论断和思想，也不是片面地把握个别词句，而是通过研读原著，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应在把握“科学理论体系”上下功夫，并从“科学理论体系”角度贯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精神实质的理解。

除此之外，应当结合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结合现实问题的历史脉络，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唯此，才能读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具体内容和精神实质。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开放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均与不同思想的比较、对话、论战、批判等密不可分。因而，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应当以开放姿态与其他思想展开比较、对话，并敢于批判和论战。习近平提出，要“敢于亮剑”，要“主动发声”，要求对不同思想要敢于进行争论、敢于对话。这里的“敢于亮剑”和“敢于发声”，就是对错误的思想、错误的思潮，要分清理论是非，要敢于论战，勇于批判。同时，积极与其他思想展开比较对话，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开放性品质，以开放的心态，吸收一切古今中外积极的哲学成果是学通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好马克思主义哲学题中应有之义。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目的，全部在于运用

读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而“不能消化”“不能运用”来解决现实问题，就是“读死书”。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均反对理论与实践相脱节地学习哲学，他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做到“真学”与“真懂”“真信”“真用”的统一，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与当前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做到真学与真懂真信真用的统一。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是辩证统一、不可分离的，只有学用结合、学用互动，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所谓真学，就是“原原本本”研读原著，认真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所谓真懂，就是真正深入思考，融会贯通，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真正搞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所谓真信，就是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行动自觉，“学之愈深，信之愈坚；信之愈坚，行之愈笃”，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认识升华、内化为毫不动摇的政治信仰、执著追求的党性原则。所谓真用，就是结合实际、学以致用，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上下功夫，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实践，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四者辩证统一，构成了一个整体，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将“四真”的精神运用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始终。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以解决当前的改革实践中的核心问题为中心。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迫切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相结合。具体而言，习近平阐述了四个方面的结合：其一，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存在论阐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党现阶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正确的社会存在基础；其二，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基本矛盾分析法分析社会基本矛盾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其三，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观点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关系，增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协同性。其四，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处理好激活改革动力，发挥地方、基层、群众理论和实践探索精神，不断深化对改革规律的认识。这些问题，为我们在改革实践中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方向和思路。

同时，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和实践智慧，往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导。在实践中尊重人们群众的实践探索，及时总结规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条件。因而，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需要我们依群众实践发展、创造性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

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应与掌握其他本领相结合

在习近平看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是第一位的，因为这关系党的性质和宗旨，关系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也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是否变质、是否能永葆活力。

但是，只有这个本领还不行，还需要具体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总揽协调、团结群众、反腐拒变等本领。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本领的掌握也应当与其他本领的掌握结合起来。在掌握其他本领中，理论联系实际，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具体领域中的问题，同时也通过具体领域本领的掌握，提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握具体问题的能力。习近平也强调应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本领与掌握其他本领结合起来，将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知识教育、领导能力教育结合起来，提高领导干部的各方面的能力和本领。

有些领导干部用事务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习近平多次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克服狭隘的事务主义和实用主义，发扬“挤”和“钻”的精神来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挤”就是挤时间，把工作生活之余的时间“挤”出来，用来学理论；“钻”就是面对理论问题，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坚持“挤”和“钻”的精神，再加持之以恒和发扬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各级党员干部就一定能提升自己的理论思维能力，就一定能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看家本领。

领导干部学习主题征文启事

——《学习时报》创刊十五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今年9月17日，是《学习时报》创刊十五周年纪念日。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学习时报》秉承“依托于读书，着眼于问题”的理念，面向全国，服务全党，广泛传播古今中外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深入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问题；以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反映总结实践前沿的鲜活经验，探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工作中的新问题，致力于为全党、全社会提供一个有影响力的思想源。

为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学习时报》特举办“我与《学习时报》”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面向全国，欢迎《学习时报》广大作者和读者、理论工作者、党政干部及社会各界人士踊跃参与。

具体事项如下：

征文体裁：文章体裁不限，文稿一般不超过2500字（深度报道或报告文学可视情况增加字数）。

内容要求：1.作品必须为作者原创；2.作品需立意新颖，观点鲜明，思想内涵丰富。

征稿时间：见报即日起至2014年9月15日止（以邮戳为准）。获选论文将在《学习时报》及中央党校报刊社其他媒体刊登。

征文评选：征文截稿后，本报将评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9月中旬（具体日期另行通知）《学习时报》将在京举办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届时邀请一等奖作者参加。本次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投稿方式：

1.征文请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报刊社　邮政编码：100091

2.通过邮件发送至：shibaozw@126.com

联系人：陈国裕　李红　林娜

联系电话：010—62807311、62805365、62806240

刘少奇的调研与《论十大关系》

□李庆刚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的独创性理论成果之一，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这一经典著作的诞生，绝非毛泽东的即兴之作；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工作，为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提供了直接借鉴。

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建立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任务客观地摆上了党中央的议事日程。经过新中国成立后7年时间的摸索，特别是通过学习苏联经验、在苏联指导帮助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实践，党中央对于搞建设有了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认识。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那样：“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对搞建设，我们是懵懵懂懂的。接着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对建设还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这番话道出了党的第一代领导人的共同心情。因此，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即将建立的时候，党中央希望在苏联模式之外，另辟蹊径，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同时也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八大做准备，按照党开展工作的惯例和做法，中央领导同志开始进行相关的调查研究工作。

调查研究首先从刘少奇听取汇报开始。按照中央分工，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由刘少奇负责。为起草好报告，1955年12月7日至1956年3月9日，在3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30多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财政、金融、文化、卫生和国民经济计划等各个方面。在座谈中，刘少奇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工作提出一些指导性意见。刘少奇的这一做法以及所提意见，对随后毛泽东提出《论十大关系》具有直接的启示借鉴作用。

在同地方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指出，新产品的花样要创新，要学习借鉴别国和地区的经验。他说：“听说有一种铁壳热水瓶，上面画着梁山伯祝英台的图样，农民因其画的是一个悲剧，不吉利，所以销路颇受影响。对这件事不要去批评。它比不动脑筋好，它帮助我们取得了经验。”“苏联过去吃了亏，以前《苏联妇女》杂志不登服装设计，时装式样总是跟巴黎走，我们不搞服装设计也就跟香港走。所以想花样很重要，想错了也不要紧，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在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也指出：“要想办法生产一些好的高级消费品，换取农民的东西。新花色的毛衣裤要多织一些。用棉纱织百褶裙可以试验。商店只供应蓝布、白布是保守的、落后的。”刘少奇还强调，要提高产品质量，关键是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为此要多搜集技术资料，有些技术资料中国现在没有，可以到苏联及其他国家去搞，也可以到资本主义国家去搞，花钱买，用各种办法去搞，……现有的好东西，技术标准要定下来，比如北京烤鸭、四川榨菜很不错，就应给它们定个标准”。在同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指出，“凡是自己没有的技术，可以向别的国家去要资料，可以派学习小组赴国外去学习，可以请外国专家、技师来指导”，“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也要尽量吸收，花钱买他们的技术，向他们学”。这种勇于向外国学习的开放的思想认识，也生动地体现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论述中。

另外，对于工业如何布局，刘少奇专门谈到沿海工厂迁往内地的问题。他说，要“考虑上海搬厂去内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这个前途。恐怕还要建些新厂”，“还有一个分散与集中的问题，什么宜于分散，什么宜于集中，怎样才有利，这也是工业上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同粮食部负责人谈话时，刘少奇明确指出要以苏为鉴。他说：“目前苏联粮食来源有四个渠道：（一）义务交售；（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三）国营农场收入；（四）国家采购。我国情况和苏联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刘少奇还指出，“国营农场将来我们不一定有苏联那么多”。刘少奇认为：“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有缴公粮的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则征购粮必须降价，农民会有意见。”所以，“改变粮食征购制度不要单纯学苏联经验，这个问题要进一步研究。”

在听取邮电部负责人汇报时，刘少奇再次提到要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问题，他说：“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对于发展邮电事业，他指出：“我国人口多而且相对集中，这是我们的特点，与苏联不同，苏联地方大，人口不密。应该找与我国有相似特点的国家去学习经验，看他们的电话、邮路是怎么搞的，而不是找苏联这方面的经验。向哪些国家学习哪些经验，这是最基本的一条。”

刘少奇的这些意见和观点，贯穿着“以苏为鉴”的精神，较早地注意到中国与外国、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国家与生产者个人等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正确处理的重要关系。这些意见和观点，随后都在《论十大关系》中得到了体现。

1956年1月中旬毛泽东从外地调研回到北京后，受刘少奇做法的启发，也让人安排组织听取了35个部门的汇报。其间，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揭露了斯大林制造个人崇拜及造成的严重后果，也促使各国共产党人认真反思苏联模式，重新思考本国的建设道路问题。在此基础上，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讲话。《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开宗明义地指出，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这一反问，明确地表明我们党要走出一条自己的建设道路的立场和态度。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也指出，要强调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

可见，1956年党在开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任务之时，刘少奇和毛泽东对探索的方向与原则等问题的认识是基本一致、互相启发促进的。基于此，有研究者指出：“《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思想原则，特别是关于经济建设中几个方面关系的处理原则，是由刘少奇首先提起，由毛泽东发挥和完成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路是一致的。”这一判断，有其历史依据，也体现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的丰富内涵。

党的思想史